



电影大师的梦想之作

——读《剩下的世界：瓦伊达电影自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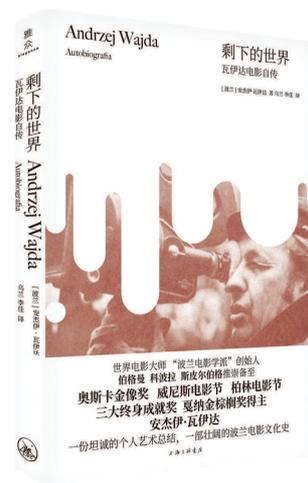
■ 简平

波兰导演瓦伊达是当之无愧的世界级电影大师，他执导的影片《铁人》获得过第三十四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并先后获得第五十五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终身成就奖、第七十二届奥斯卡金像奖终身成就奖、第五十六届柏林国际电影节终身成就奖。他的影片《一代人》《下水道》《灰烬与钻石》《福地》《大理石人》《卡廷惨案》《甜蜜的冲动》等都是交口皆碑的杰作，但他在自传《剩下的世界：瓦伊达电影自传》一书中，却用最动人的文字、最长的篇幅叙述自己梦想拍摄却没有如愿的众多作品，读来比成功搬上银幕的电影更加令人感慨。

瓦伊达经历过二战时期苏德对波兰的瓜分，他担任骑兵团军官的父亲被内务人民委员会秘密杀害，而他电影导演生涯的黄金期则主要是在波兰人民共和国时期，所以，特殊的经历和特殊的时代让他在电影创作中备受煎熬。他当然想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通过电影艺术表现出来，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的许多梦想注定不可能实现。瓦伊达在《梦想更动人》整个一章中，叙述了与自己失之交臂的几部电影，其中就有《辛德勒的名单》。本来，这部电影是由瓦伊达来拍摄的，剧本都已拿到了，可后来由于波兰方面拿不出这么大的一笔预算，结果落入了美国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的囊中。显然，这事让瓦伊达耿耿于怀，但体制问题就是限制了他，瓦伊达用既羡慕又不无嫉妒的笔触写道：每一个导演都是某种程

度上的“神”，当然这个程度多少要看电影的预算有多少。虽然没能抢过斯皮尔伯格，可瓦伊达仍真心实意地帮助斯皮尔伯格落实了一些场景在波兰克拉科夫的拍摄，同时，他还建议把《辛德勒的名单》拍成一部黑白电影。斯皮尔伯格听了他的建议后问他的制作人：“要不我们拍一部全黑白电影，只有辛德勒的眼睛是蓝色的，如何？”瓦伊达写道：“在几千米的黑白胶片上，只把辛德勒的眼睛涂上蓝色，这个成本大概相当于整个波兰电影业几年的预算，因此，我见到了一位电影‘真神’，他只知道一个词：就这么干！”

瓦伊达一直想拍一部发生在森林里的故事片，甚至连片名都已想好了，叫《打猎》。有一次，他和剧作家博格丹·柴什科一起去打猎，他们屏住呼吸，搜寻着可能隐藏在森林深处的野鹿。他问博格丹，我们来这里做什么，博格丹顽皮地回答：“我们就是狼！”这个回答让瓦伊达联想到森林里的弱小动物会被我们、也就是猎人，像狼一样地捕杀掉。想到这里，他的头皮一阵发麻，但却产生了电影的灵感。那个灵感的主题是回归，他说他仿佛看到了老游击队员的



《剩下的世界：瓦伊达电影自传》

[波] 安杰伊·瓦伊达著
雅众文化公司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

世界——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又一次回到森林，寻找先前的足迹，与此同时他们也很明白，自己的生活已在别处。瓦伊达随即跟博格丹聊这个话题，但结果却不了了之。后来，他也曾找过另外几位编剧，但没有一个能让瓦伊达满意。正当他要放弃这个计划时，一位列宁格勒的剧作家亚历山大·戈尔曼引起了他的注意。后

来，戈尔曼这样跟他说：“你想象一下吧，五个官员带着太太来到森林，他们特意到这里来讨论人事变动的重要事情，带着太太是为了让别人以为他们仅仅是来游玩打猎的。男人们在森林小屋中召开闭门会议，而年轻英俊、精力充沛的护林员则引导太太们用他们丈夫的猎枪去打猎。她们向所有的动物开枪射击，这样的滥杀行为让护林员非常愤怒，但他也保持了应有的分寸。最后，当她们出了森林走近小屋时，看见内务人民委员会的车停在那里，他们的丈夫戴着手铐，在守卫的看管下，坐着囚车消失了。”戈尔曼讲完这个故事时，瓦伊达明白这是一位在伟大的文学作品中成长起来的纯正的俄罗斯作家。但是，剧本最终没能通过，瓦伊达梦碎一方。《未来学大会》也是瓦伊达没有能够梦想成真的一部作品。这部原创小说的作者是波兰著名的科幻小说家斯坦尼斯瓦夫·莱姆，在瓦伊达看来，这是一部奇异、荒诞又非常搞笑的小说。故事发生在一家宾馆，这里正在举行未来学大会，同时，在这家宾馆里还有另外一场低俗刊物出版人的聚会。科幻与低俗混在一起，场面相

当逗趣。两个大会的主办者决定想办法避免冲突，他们在水里加了强力迷幻剂，但是小说的主人公是个谨小慎微的人，他一口水都没喝，因此将这令人震惊的一切尽收眼底。纽约彻底沦陷了，成了一片废墟，这座城市涌进太多的人，根本无法控制住巨大的破坏性局面，唯一可以逃离现实的方法就是服用政府发放的致幻药，它的作用就是让大家将这不可思议的现实看成正常的世界。这自然是对现实的嘲讽和暗示，所以尽管瓦伊达已在美国找好了能当拍摄场地的宾馆，但最后还是无法拍摄。后来，莱姆小说中的这个精彩构思多次出现在美国编剧和导演的电影里，而2013年，以色列导演阿里·福尔曼更是将其搬上了银幕，瓦伊达由此写道：“遗憾的是，我的这部电影只能出现在我的幻觉里。”其实，莱姆认为，除了题材不为所容，拿不到资金，当时电影技术的缺乏也是一个原因，没有电影技术的支撑，科幻类的剧本难以实现。

“梦想往往比拍成的电影还要动人”，瓦伊达在人生“剩下的世界”里，回瞻既往的感慨也让我们深思。作为一部当代波兰电影文化史，瓦伊达在该书首版前言中写道：“如果说，我拍摄的某些电影曾打动过观众，曾激起过他们沉睡中的需求和情感的话，那也只是因为，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中，我也有过与他们一样感同身受的经历。”事实上，他梦想过、努力过但没拍成的电影同样如此。

音乐和哲学：寻求救赎之路

——读《战时家族：维特根斯坦》

■ 徐来

维特根斯坦这个姓氏，曾经被看作是维也纳精英的标志。这本书所记述的维特根斯坦家族，经历了一战前维也纳的“宴欢年代”，也经历了硝烟四起的战争年月。尤其是在二战时，犹太血统的嫌疑，正好给了覬覦维特根斯坦家族财富的纳粹德国以机会。最终，整个家族，连同他们的宅邸，随着时间变成了红尘中的一个传说……

有这样一些学科，人们接近它的根本原因不只是出于兴趣，而是为了寻求救赎。哲学如此，音乐亦然。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是奥地利的一位对20世纪哲学发展有着转折性影响的分析哲学家。众多传记对路德维希有着纷纭的描述，既是天才又是疯子，自我放逐，为寻求“体面的自杀”而上战场，来自极富有的家族却舍弃所有财富……

应该说，不仅仅是路德维希的哲学成就让他成为20世纪的一个传奇，他的个性与生活经历，对人们来说也是谜题一般的存在。该书作者亚历山大·沃作出了一个另类的选择，就是不再把视线聚焦在路德维希身上，而是将镜头向后拉远，把整个维特根斯坦之家都纳入画面之中。和以路德维希为焦点的传记比起来，这种远距离的视角，因为去掉了复杂的细枝末节反而让整个叙述更为集中，从而得以清晰地勾勒出路德维希、保罗以及这个家庭中每个人看似互不相容实则相互交织的人生历程。

路德维希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上面有

四个哥哥和三个姐姐。母亲利奥波蒂娜个性软弱而没有主见，父亲卡尔作为钢铁大亨，个性又太强硬。虽然整个家庭和音乐有着不解之缘，但卡尔却反对任何一个儿子从事音乐，而是希望儿子们能如他一般在商业上有所成就。因此，孩子们承受了极大的压力，这个家庭，只有在演奏音乐时，才能达到其乐融融的状态。正如书中所说，“维特根斯坦家兄弟——汉斯、库尔特、鲁道夫、保罗和路德维希——身上那种要在父亲打造的钢铁、军火和银行业中出人头地的压力，促成了他们所有五个人身上那种神经性自毁的张力。”

这种张力在维特根斯坦家最极端的表现，就是自杀。年仅22岁的鲁道夫，因担心自己的性取向被公开而选择在柏林的一个小餐馆服毒自杀；汉斯在20岁时为躲避父亲而逃到了国外，失踪，疑似自杀。而另外的一个兄弟库尔特，是个单纯天真的大孩子，唯独他继承了父亲的事业，但后来却还是在二战的意大利前线自杀了。

很难去评价这样的家庭氛围对保罗和路德维希的影响，但用书中的话来说，两兄弟“不可能对那可恶的年岁里在家中弥漫的氛围完全无知无觉，而且在以后人生的不同阶段，他们两个都将和自杀险恶地咫尺相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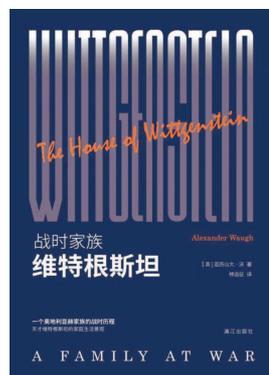
但同样是和自杀的“咫尺相隔”，对路德维希和保罗来说，形式却完全不一样，他们的应对态度也迥然相异。

路德维希，因父亲的私家教育而缺乏交际能力，被家人认为是不够优秀的孩子，音乐上又自认不如哥哥姐姐有天赋，如果没有走上哲学道路，在这种自卑下，他的人生很有可能是另一种结局。路德维希曾经向罗素提出自己的困惑：“……如果我是一个十足的白痴，我会成为航空学家；如果我不是，就会成为哲学家。”而罗素给了他及时的指引：“……仅读过第一个句子，我便对他讲：‘不，你一定不要成为航空学家。’”

成为航空学家，是父亲的希望，但对路德维希来说，这只能算是一种逃避。事实上，“逃避”几乎是路德维希的人生常态，不管是准备选择航空学，还是参战请求危险行动，抑或之后在小山村当教师，都是他“自杀”于这个世界的另一种形式。而拯救他的，从来都是哲学。哲学是一种会让人深陷其中的东西，但对哲学的接近，却不会是因为情愿，而是生活所迫。与其说这是路德维希的天赋，还不如说，哲学是一种能让他有勇气面对世界的路径。

而保罗，在年少时就以当一名钢琴家为理想，连父亲的坚决反对都不足以成为他的阻力，但命运却和他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在一战中他失去了自己大部分的右臂。路德维希对此极为惊骇，认为这“需要怎样的哲学才能挺过去”！

保罗没有依靠任何哲学，他依靠的只是音乐。他决定继续做一位音乐会钢琴家。



《战时家族：维特根斯坦》
[英] 亚历山大·沃著
钟远征译
漓江出版社出版

父亲的训诫和哥哥们的自杀给他的反而是一种警示，他意识到对他来说“成功之外的选择不是失败，而是死亡”。音乐，是拯救保罗的唯一出路。在战俘营中，他日复一日地练习如何把肖邦的“革命”练习曲用左手编排。之后，他又约请了拉伯、施密特、施特劳斯等作曲家为他创作左手作品，以极强的毅力毕生坚持自己的演奏事业。

如同汉斯和鲁道夫的自杀一般，同样也说不清，保罗的人生态度对路德维希造成了怎样的影响。看起来，路德维希比保罗消极得多，总是想着从这个世界逃离，但该书作者却认为，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缺少自杀所需的“懦弱”。面对各自的命运，他们都找到了能够拯救自己人生的出口，从而得以和自杀一次次“咫尺相隔”而又“擦肩而过”。

保罗和路德维希，在家族的磨难面前，被音乐和哲学所拯救。音乐，对保罗和维特根斯坦家族来说，是同生活达成和解的唯一筹码；而哲学，更是路德维希和世界进行沟通的仅有中介。也许，对维特根斯坦家族而言，世界上本没有什么艺术家和哲学天才，有的只是在生活的苦痛中寻求救赎的普通人而已。